

南宋三大刻書中心與書籍對外傳播圖

研究助理曾威智繪圖

# 南宋書籍的出版地域 與行銷市場

南宋以文治國，上自政府，下至百姓，皆崇尚文治，因而形成文風鼎盛的國家格局。政府推動與鼓勵文化與藝術，庶民社會對多元知識的渴求，造成閱讀風潮的興起，使得圖書出版事業蓬勃發展。本文試圖透過南宋書籍的生產、行銷及傳播之間的關連性，重塑當時圖書出版文化的風貌。

許媛婷

宋人葉夢得（一一〇七—一一四八）《石林燕語》曾經指出：「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從北宋以來，兩浙、四川及福建就是書籍的三大出版

中心，待南渡以後，除了杭州佔有政治及文化資源的先天優勢外，三地形成刻書中心的主要因素，便是皆擁有豐富的山林資源、優越的地理要道，以及帶動文化發展的經濟條件。

## 一、三大出版中心

臨安一方面延續北宋以來的良好刻書基礎，又吸納來自汴梁優秀的刻書移民，使得臨安一舉成為南宋最繁

榮的出版中心。南宋立國之初，由於國家物資匱乏，包括書籍在內等各種物品皆短缺一齊，是以國子監雖於紹興十三年（一一四三）設置於岳飛舊宅，但初

期監版多有闕失，因此臨安官府不但廣蒐各地舊書版，更命人委託附近州郡代為刻書；而國子監的刻書功能，一直要到紹興末年才正式運作。

南宋孝宗即位，國子監漸入正軌，許多跟科舉考試或經世致用的經、史類書籍，也相繼版刻問世。像是《禮部韻略》，便是一部北宋仁宗時期由禮部刪定《集韻》僻字而重新頒行的韻書，做為學子考試使用的官方定本。南宋之時，官方除了疏注編成《附釋文互注禮部韻略》之外；又根據毛晃、毛居正父子家藏原稿增修補註，編成《增修互注禮部韻略》，這些書籍後來皆成為南宋學子參加科考必備的參考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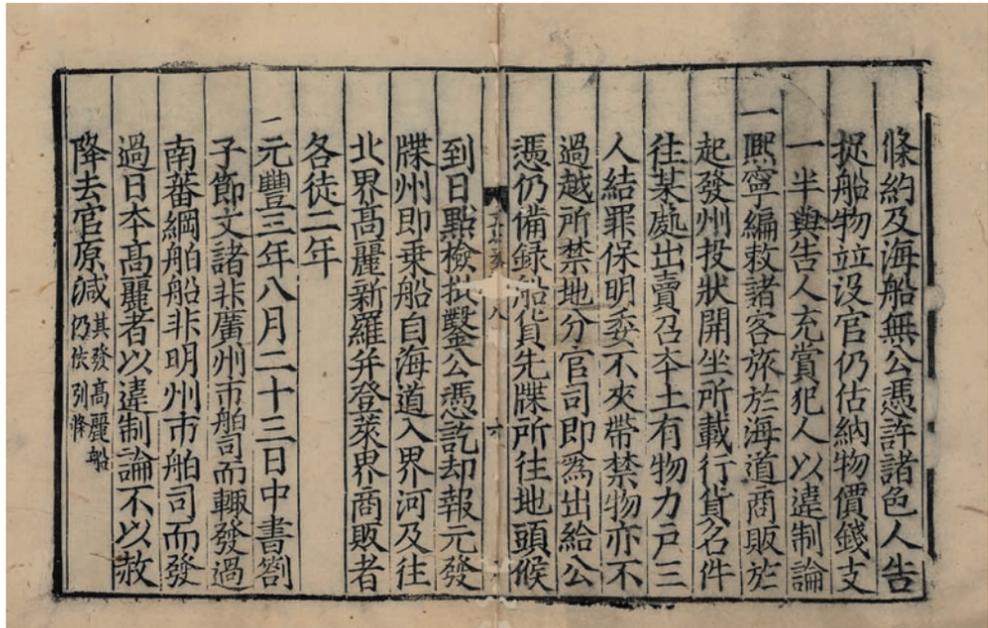
此次展件中的南宋嘉定十六年（一二二三）國子監刻《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內容審慎嚴謹，為後世流傳之祖本。由於為官方頒行之書，在當時會廣被傳刻，但存世至今者卻屈指可數。院藏此部為罕見宋刻孤本，版式寬朗、字體工麗、紙張品質良善，充份呈現南宋國子監的官方刻書特色。

除了官方刻書精美良善之外，臨安府地區的私人書坊在因應科舉考試及商業營利的考量下，在刻書數量及品質上，亦不比官方遜色。當時可考書舖至少有二十家，其中著名者如臨安府棚北睦親坊南的陳宅書籍舖、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張官人諸史子文籍舖、橘園亭文籍書房等，皆頗富盛名。這是因為在官方重視編校經、史類書籍，並積極出版與科舉相關教科書，也會吸引更多的坊間書舖投入刻書事業。隨著官民競逐刻書的結果，不但促使南宋刻書經濟效益的提升，同時增進閱讀文風，開啓出南宋文化成就的新格局。

## （二）四川眉山

宋室南渡後，成都因未受戰火波及，初期刻書活動仍持續不廢。然而，成都並非一枝獨秀，其西南隅的眉山刻書也慢慢滋長茁壯，而後更超越成都，成為四川的刻書中心。眉山因擁有充沛的森林資源，且位處交通要道，因而使眉山一地具有與成都競爭的實力。然而更關鍵的因素，則是來自官方的推動力量。





《蘇文忠公奏議》 宋眉山刻大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冊府元龜》 宋蜀刊小字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諸臣奏議》，是目前被視為世界上存世最早的本。其版式宏朗、字體遒勁、紙張潔白堅韌，內容校勘嚴謹、品質精良，適見證前述福州地方官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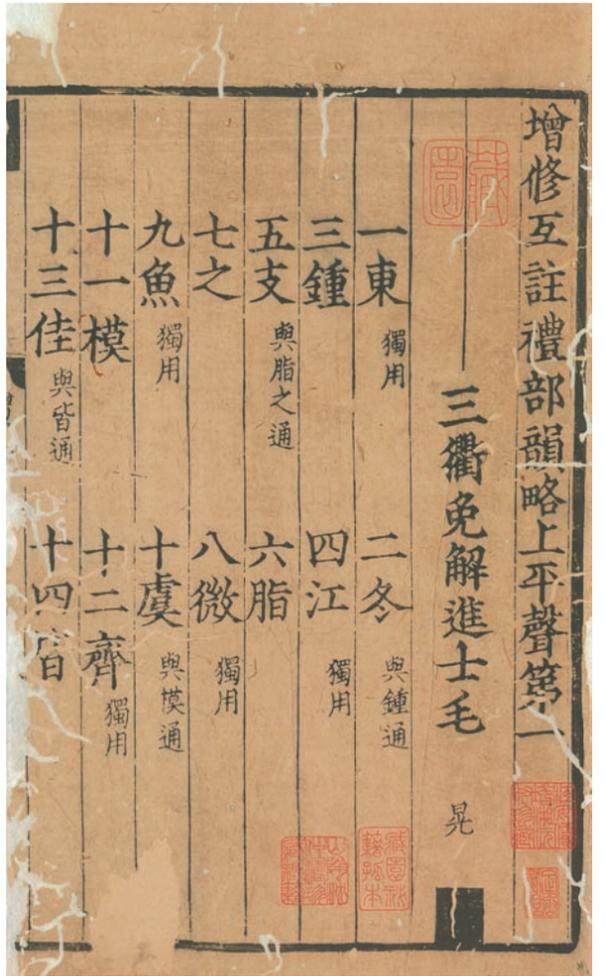
本自我高度要求的水平。然而，從孝宗淳熙年間（一一七四—一一八九）開始，福州地區刻書雖仍持續不斷，但規模卻逐漸縮小，已遠不及以往的

繁榮盛況。建陽，位於福州西北方，在宋室南渡後，逐漸以刻書聞名於世。西邊的麻沙，及西南邊崇化兩地書坊，

紹興十一年至十四年間（一一四一—一一四四），井度（字憲孟）擔任四川轉運使期間，將七史交送成都西南的眉山付梓刊印，世稱為「蜀刻大字本眉山七史」。其後，因南宋高宗深好蘇軾（一〇三七—一一〇一）詩文；孝宗繼位，又大力稱讚蘇軾人品文章。使得蘇軾身後如上雲霄，連帶父親蘇洵（一〇〇九—一〇六六）、弟弟蘇轍（一〇三九—一一一二）著作亦隨之為時人所重，其中以蘇軾故

里的眉山書坊競相刷印的動作最為積極。此次展示院藏《蘇文忠公奏議》，便是眉山書坊雕鏤的大字本。其版面開闊、行款疏朗、紙張潔白堅韌、墨色濃厚；刻書字體字大如錢、遒勁古拙，近似顏體而略為扁長。反映出眉山刻工來自兩浙地區，而深受浙刻本行寬字大風格的影響，然字體又與浙地稍有出入，卻仍保有蜀地古拙勁力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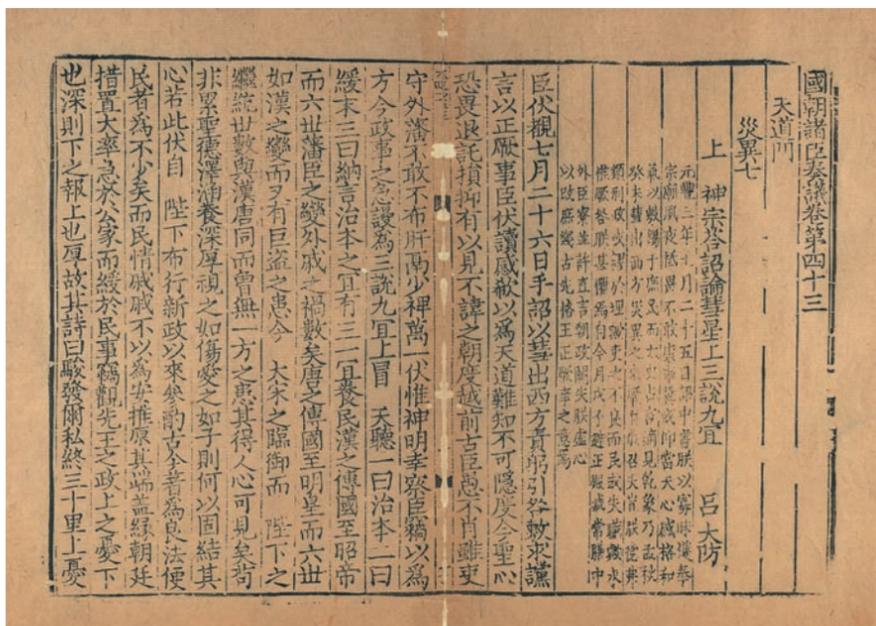
此外，四川地區另有「小字本」行世，其雕版略小，版面行數多、字數亦較緊密。此次展出的蜀刊小字本《冊府元龜》便是作為比對開闢疏朗的《蘇文忠公奏議》而來。《冊府元龜》每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蘇文忠公奏議》則是每半葉九行，行十五字。兩者相比，小字本雖無大字本的大器氣勢，惟其顯得行密字緊、綿密有序。至於書商採用小字本的用意，必然與此部卷帙長達千卷的龐然巨著有密切關係，充份反映小字本的流通主要出於書商成本考量的目的。



《增修互註禮部韻略》 宋嘉定十六年國子監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劉賓客文集》 宋浙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國朝諸臣奏議》 宋淳祐十年福州提舉史季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由於紙、墨容易取得，刻書業成爲此期以後盛名遠播，大有超越福州的架式。據祝穆編《方輿勝覽》記載建寧府土產，首項便是「書籍行四方」，

下小字注曰：「富沙（即麻沙）、崇化兩坊產書，號爲圖書之府。」建陽書坊刻書量多，以至被視爲代表福建的地方性產物，商賈或透過水路將書籍行銷他處，或經由海路販售域外；各地商人也不惜遠道前來競購，做爲饋贈朋友、同事的禮物。

## 二、造紙與刻書

兩浙臨安、四川眉山與福建建陽在各自擁有其獨特的經濟與文化條件下，逐漸建構出此三地刻書中心的地位。但在書籍的生產環節中，回歸到最基本的問題來思考刻書中心的形成，便不難發現，紙張來源與取得順遂與否，正是左右書籍的生產效率、品質好壞，以及流傳久遠的根本原因。

東漢蔡倫已懂得使用樹皮、麻、破布等植物纖維造紙；到了隋唐五代，造紙技術已有突破性的提升，而造紙原料也出現多樣性選擇，舉凡麻、桑、籐、楮樹，以及竹木等，皆成爲造紙的材料。兩宋以後，造紙技術在穩定中持續進步，但因爲自然環

境的差異，使得三大刻書中心印書所使用的紙張各具特色。北宋蘇易簡指出：「蜀中多以麻爲紙。……江浙間多以嫩竹爲紙，北土以桑皮爲紙。」

事實上，四川自唐代以來便是麻紙的主要產地。到了宋代，該地雖依舊沿襲著以麻造紙的傳統習慣，惟其產量已大不如前。由於麻紙是中國最早使用的造紙原料，取自大麻、黃麻、亞麻和苧麻等韌皮植物的纖維，其特質是柔韌、細緻而不透水。然隨著四川刻書事業的擴張，市場對紙張需求越多，促使當地不得不修正以麻造紙的傳統習慣，開始納入諸如藤、桑、楮等植物爲材料，呈現四川地區從堅守以麻紙爲主的傳統理念，開始轉向多元取材的紙張變化。

至於兩浙及福建地區，因其地處江南，氣候及溫度適合桑、楮、竹樹的生長，因此造紙原料也多取材自這類材料。然而，兩地仍因其造紙原料取得的差異，而出現書籍產量及品質上的不同結果。兩浙地區雖生產竹紙，但刻書用紙多偏好使用皮紙，原因是取其紙質堅密，光滑瑩潔的優

點，可以充份展現出浙刻本紙墨精良的高度品質。

本院所藏《劉賓客文集》，爲南宋紹興年間兩浙附近書坊所刻的本子。紙張採用桑樹皮纖維印成，通稱爲「皮紙」。由於桑皮紙色澤潔白，韌度及彈性極佳，不易拉扯斷裂，是很好的造紙原料。兩浙地區採用桑樹或楮樹爲造紙原料，不僅與當地材料取得的便利性有關，也因桑皮紙紙質堅韌，符合高品質的刻書要求。

相對地，福建地區紙張的生產，配合當地刻書市場的商業取向，選擇竹紙印書，乃取其成本低廉，薄利多銷的考量。建陽書商喜歡以竹紙刻書，一方面竹子本身具有豐富纖維性，是適合造紙的材料；而竹子野生易長，隨處可見，產量不虞匱乏；更重要的是其價格低廉，可以有效降低紙張與刻書的生產成本，從而達到大量生產、薄利多銷的商業效果；又因其價格低廉，流通量大，聞名遐邇，遂成爲代表建陽地區的重要文化產業，進而一躍成爲與兩浙、四川並列爲刻書中心。閩商之所以採用竹紙作爲刻

書的主要材料，正充份反映當地書商高度的市場經營策略，以及重利的商業考量。

展件中南宋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建安祝氏刻《新編方輿勝覽》，便是採用竹紙印製而成。閩、粵氣候適合竹子生長，取材容易，惟竹紙木質素含量較高，分離不易，故書籍置放時間愈長，紙質愈易變深、脆化、斷裂，難以良好保存。「書籍行四方」，雖然是福建刻本的優勢，卻無法久存，乃因商人爲營私求速、短視近利所帶來的缺憾。

## 三、書籍的行銷市場

書籍出版之後，還必須透過各種銷售管道使之廣泛流通，進而促進文化的傳播與融合。首先，南宋時期書籍行銷風氣的形成，自有其社會背景，可以概略分成以下幾種情況：

### （一）官民競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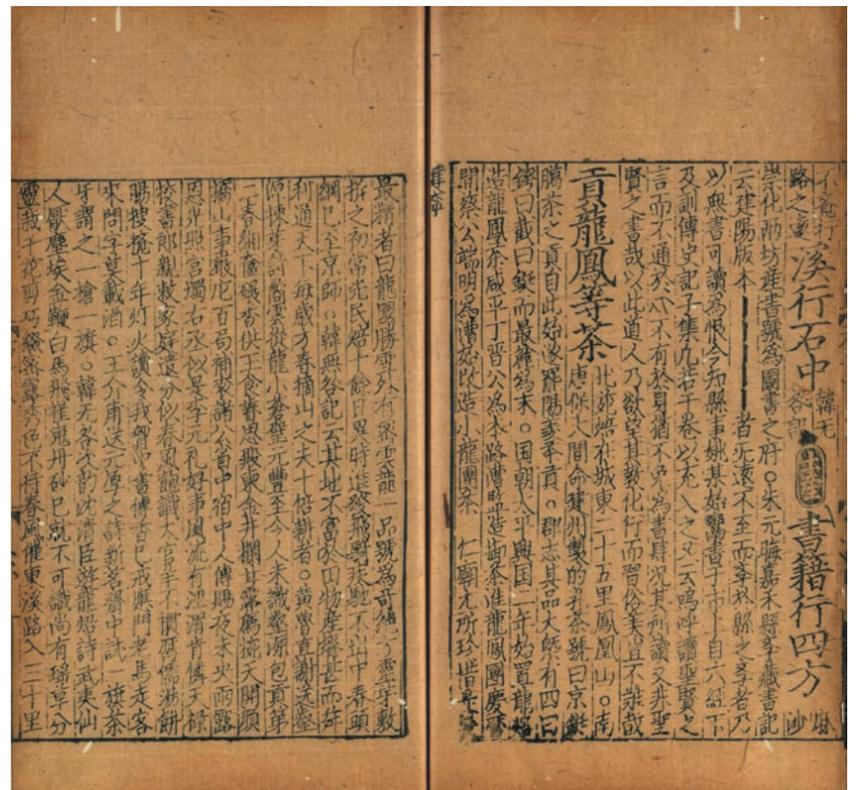
自北宋以來，國子監不僅負有教育功能，還必須承擔刻書工作。刻書活動主要由書板庫負責鑄板，管理人稱爲書庫官。關於書庫官的工作，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 宋紹熙二年建安余仁仲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歷代名醫蒙求》 宋嘉定十三年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新編方輿勝覽》 宋咸淳三年建安祝氏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春秋經傳集解》 宋淳熙間撫州公使庫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為「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于官。」換言之，書庫官不僅掌管印書，以備朝廷賞賜之用；同時也必須肩負售書的工作，收入所得則歸入國

庫。  
南宋年間，官方恢復自行定價並出售國子監本或地方官刻本的政策。據清人葉德輝《書林清話》一書記載南宋淳熙三年（一一七六）舒州公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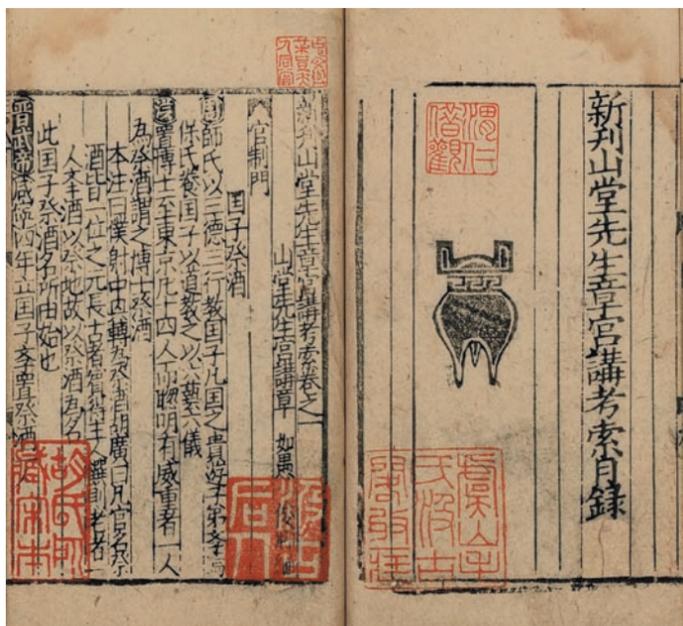
庫刻曾種撰《大易粹言》十二卷。卷後牒文中記載該書雕造之成本及書價：  
今具《大易粹言》壹部，計貳拾冊。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

紙副耗共壹仟參百張，裝背饒青紙參拾張，背青白紙參拾張，棕墨、糊藥、印背匠工食等錢共壹貫伍佰文足，賃板錢壹貫貳佰文足。庫本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捌貫文足。右具如前。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具。

由上述二例可知，官方詳述印書所費紙張、棕墨、雕版價錢，以及匠人工食等錢，再公告書籍售價，其用意雖申明官方印書販賣是為了支付刻書成本，原非與民爭利。然而核算其成本與售價，將可發現官府售價實高出成本一倍以上，其所得利潤相當豐厚。至於利潤盈餘所得又是如何運用？據淳熙十年（一一八三）明州象山縣學刻林鉞《漢雋》一書，書中有楊王休題記云：「象山縣學《漢雋》每部二冊，見賣錢六百文足。」又云：

善本銀木，儲之縣庠，且藉工墨盈餘為養士之助，故書未詳贖工價。宋元郡庠書院，多以刻書印需供膏火，不同坊費居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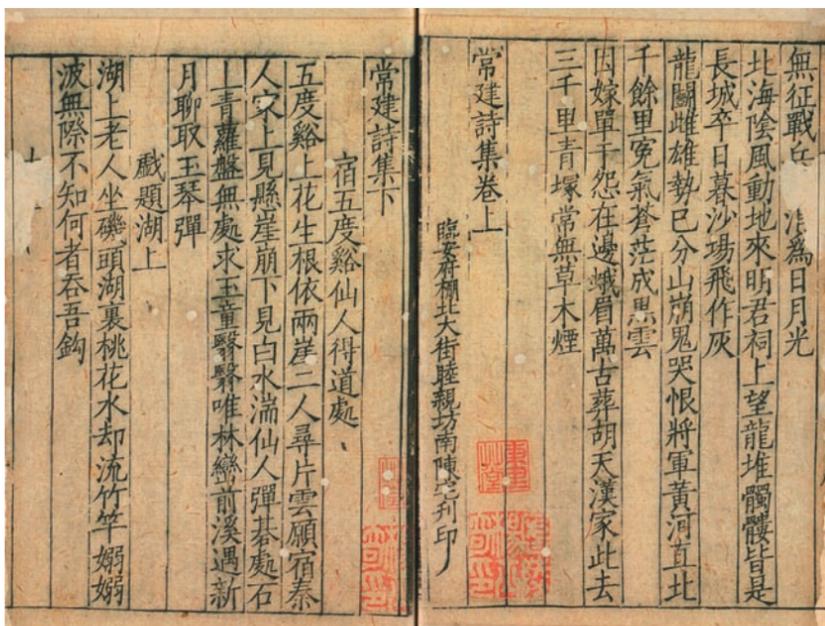
上引例子雖來自書院刻書及銷售記錄，但其盈餘供「養士之助」等公用



《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 宋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歷代名醫蒙求》，即為教導幼童醫家教育的一部童蒙讀本。全書四字為一句，兩句作一聯，採用韻語偶句的寫作方式，列述古今史書所載二〇二位名醫故事，內容淺顯通俗，幼童易於記誦。對促進庶民日常生活知識以及推廣大眾教育具有重要貢獻。

院藏的《歷代名醫蒙求》，是由南宋臨安地區尹家書籍舖所刊行，



《常建詩集》 宋臨安府陳宅書籍舖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開銷，推知官方刻書所得主要亦充作公務用途。由於南宋准許地方政府或縣學書院自行雕印書籍，固然出自政治目的與教育需要，但其出售利潤豐厚，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官方印書風氣始終歷久不衰。

院藏宋淳熙間（一一七四—一一九〇）撫州（今江西臨川縣）公使庫刊行的《春秋經傳集解》，正是來自公使庫出資刊印的官方書籍。公使庫為宋代官員出差旅居的招待寓所，原由政府出資支付其開銷，但由於資助有限，因此也准許公使庫刊印書籍，自補貼庫中經費的不足。雖然印書銷售為公使庫營利的合法手段，但並未影響書籍品質，所刻書籍多經精審校勘，而紙墨古澤，依舊維持當時官方刻書的高度水平。

由於官方刻書版式寬朗、紙墨精良、校勘嚴謹，民間書坊為爭取市場，亦多模倣國子監本或地方官刻本形式，極力講求版本及內容上精勘校審，甚至敦聘良工鏤刻，力求完善。由此可知，南宋時代書籍行銷風氣的形成，一方面源自於官、民均具商業取向的積極精神；另一方面則是官、民兩方從講求版本精美，進而相互競技，亦是重要因素。

展件 中 南 宋 紹 熙 二 年（一一九一）建安地區著名出版商余仁仲所刻《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書

中牌記對外宣稱，標榜是書為結合自家所藏國子監本，及從江浙諸處所得官刻本，取其參校嚴謹、刊印精良的優點，作為刻書模範。由於余氏出版的書籍力求精美，且用心校刊、不計成本的嚴謹態度，不僅奠定南宋余氏萬卷堂的顯赫聲名，其出版書籍更足與當時官刻本相媲美，而廣受時人喜愛與蒐藏。南宋時代，官民競技的結果，不僅刺激當時圖書出版業的日益求新精神，更是形塑南宋社會提升閱讀文化，並力求精緻化的重要基礎。

### （二）庶民商機

民間書坊除了致力維持刻書品質精良，藉以爭取少數菁英階層的蒐購外；還積極開拓伴隨庶民社會發達以來，下層民衆對日常用書或通俗讀物的市場需求，像是醫書、類書、或話本小说、啓蒙讀物等出版品。這些從來不屬於官方出版重點的書籍，也成為坊間發展出版事業的另一個商機。

南宋時代，庶民文化展現出豐富的活力，民間書肆為了迎合庶民大眾口味，遂出版相當多的普及讀物與通俗性書籍。例如南宋周守忠所編的

編者序後有「臨安府太廟前尹家書籍舖刊行」牌記一方，清楚標示本書的來源，並申明版權用意。史料有關南宋尹家書籍舖活動記載相當稀少，而所刊之書籍存世更為罕有。就目前流傳下來的出版作品，除本院的《歷代名醫蒙求》外，尚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唐代李復言《續幽怪錄》，與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宋代章炳文《搜神祕覽》，從中即可略知尹家書舖的出版品，多以迎合庶民大眾的通俗類讀物為主。其行銷對象著重下層民衆，其致力開拓庶民消費群的用心可見一斑，成為推動南宋庶民知識與傳播大眾文化的最佳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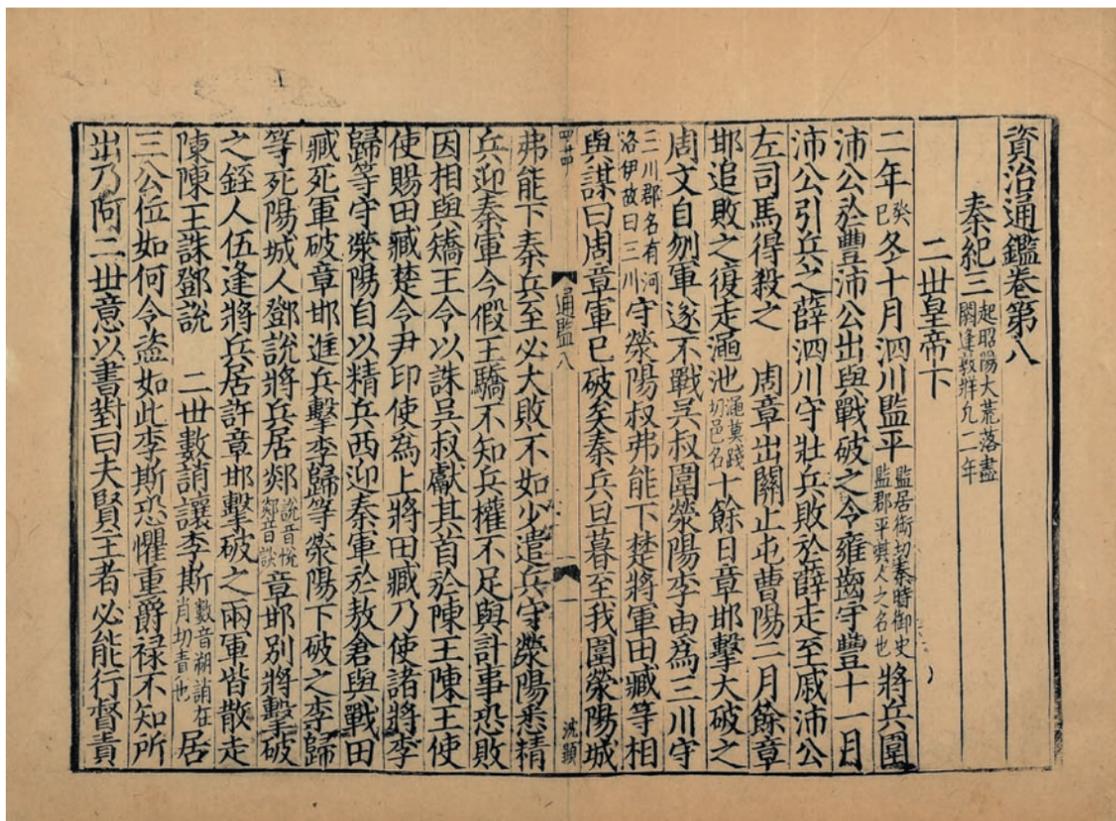
展覽中另一部同樣值得注意的作品，為南宋民間書坊重新刊印盛唐詩人常建的詩集。常建，生卒不詳，唐開元十五年（七二七）進士，一生仕途並不得志。其詩清新靈逸，語言洗鍊，體現作者淡泊聲名，追崇自然恬適的詩境。詩集收錄常建所著五、七言詩計五十七首，由南宋臨安府陳宅書籍舖所刊。集中刻有「臨安府柵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牌記一方。

對民間書商而言，以顧客為導向的出版策略，是最具實際，同時也是最有利的出版管道。而對於選擇有能力且必須購買書籍的對象中，

### （三）科考市場

關於陳宅書舖開設的時間，據考始於寧宗嘉定初年（一一二〇—一一二四），終南宋之世，仍經營未絕，時間長達七十年之久，堪稱南宋中晚期歷史悠久的民間書商。陳宅書籍舖所刻書籍廣受士人歡迎，書籍行銷亦具規模。該書舖所刻書籍字體講求獨樹一幟，多仿柳公權的清緻纖雅、工整秀麗，刻意有別於當時其他書商喜用渾圓緊密的歐、顏字體；另一方面，該書舖刻書運用牌記以申明版權，對於提升版權意識、確立書商形象與品牌皆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對民間書商而言，以顧客為導向的出版策略，是最具實際，同時也是最有利的出版管道。而對於選擇有能力且必須購買書籍的對象中，



《資治通鑑》 宋鄂州覆刊龍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六經圖》 宋建陽刊巾箱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資治通鑑卷第八 秦紀三 起昭陽大荒落盡 關建敷拜九十二年 二世皇帝下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 監居街切秦時御史 將兵圍 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 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薛走至戚沛公 左司馬得殺之 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 邯追敗之復走涵池 涵池 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 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 三川郡名有河 洛伊故曰三川 守滎陽叔弗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 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日暮至我圍滎陽城 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遣兵守滎陽悉精 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 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 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 歸等守滎陽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 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 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郊 鄧說 章邯別將擊破 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皆散走 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 李斯 居 三公位如何令蓋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 出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王者必能行督責

佳選擇。書商取巾箱本的裝幀小巧，紙墨成本所費不多；而其隨買隨棄的特性，又可帶來薄利多銷的效果。院藏南宋章如愚編《新刊山堂先生章宮講考索》、南宋楊甲《六經圖》，便是採用巾箱本形式，在當時成為學子赴考必備的參考用書。

隨著巾箱本銷售量大且快速，遂引起各地書坊爭相印製，其中又以福建書坊所刻數量最多。巾箱本的出現，不僅反映南宋書坊商人積極營利的行銷精神，而其方便攜帶的特性對於帶動跨地域的書籍傳播，可以說是南宋書籍流通過程中多元化的最大功因。

除了在裝潢形式上力求新意外，在字體的突破，也是民間刻本推陳出新的行銷手法之一。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資治通鑑》，一九一〇八六《資治通鑑》，是一部長篇編年體的通史類史書，也是官方指定出版的重要史學著作。北宋時，已在杭州出版過《資治通鑑》；待南渡後，高宗紹興二、三年（一一三二—一一三三）間，又令兩浙東路提舉茶鹽司公使庫重雕《資治通鑑》。在官方重視下，南宋各地書坊也紛紛梓印發行。然而相較於官刻本的版闊字大，民間的坊刻本、私刻本則另以標奇立異、推陳出新來推銷這部龐大的史學鉅著。

此次展出院藏南宋光宗（一一八九—一一九四）年間由鄂州（今湖北武昌）鶴山書院根據四川廣都費氏進修堂刻本重新覆刻而成。四川廣都費氏進修堂向來以精加校正、字體遒勁為刻書特色，被稱為蜀刻中的佳本。其中又以龍爪本的《資治通鑑》最為出名，世稱「龍爪通鑑」。所謂的「龍爪本」，是採用龍爪書體做為刻書字體而得名的版本名稱。廣都費氏進修堂書坊以龍爪書體雕鏤《資治通鑑》，不僅耗時費工，且旁人難以模仿，成為書坊銷售的主要賣點。此書刻印精美，字體特殊，充分反映出書商為求拓展市場，採取標新立異、出奇致勝的行銷手法，不但可以刺激讀者的購買慾望，更成為後世書院刻書模仿的典範，確實達到宣傳與傳播的最佳效果。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廣大的科考學子遂成為書商極力爭取的客戶群。因此，書坊為求速利，大量出版科舉考試將會用到的各種纂圖互注經、子類書籍、科舉考題大全、時文，或者字書、韻書的參考用書等等，其目的便是在迎合市場需要，並且爭取市場佔有率，使學子甘願花費以購買坊間出版的書籍。

南宋書坊在出版科考用書時，為了增加書籍的實用功能，還會採用「纂圖」、「互注」、「音注」、「批點」、「重言」、「重意」等手段，利用書中添加的圖、表、音注、名家批點，或整理各種解釋等方式，藉以廣泛吸引學子購買的意願。以院藏宋版圖書為例，有建陽書坊刊《纂圖互注毛詩》、《纂圖互注荀子》、麻沙劉氏仰高堂刊《音注河上公老子道德經》、咸淳間建安地區刊《新編諸儒批點古今文章正印》，以及《蔡本點校重言重意互註尚書》等書即是最佳證明。上述類型參考用書，出自建陽書坊的比例甚高。

建陽書坊商人聰明機巧，不僅了解到科舉用書的市場形態，並且能

掌握消費者的需要，充分展現該地書商高明的行銷手腕。在南宋建陽麻沙地區所刻的《纂圖互註六子全書》，書中〈揚子序〉未有牌記一則，曰：「本宅今將監本四子纂圖互註，附入重言重意，精加校正，茲無訛謬，騰作大字刊行。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誠為益之大也。」牌記內容雖是書商的行銷廣告，但「務令學者得以參考，互相發明」，點出建陽商人費盡心思增添「纂圖、互註、重言、重意」的做法，希望透過這些整理功夫，幫助學子順利金榜高中。這些做法，不盡是單純出於商人的營利意圖，其細心體貼之處，更是締造商機的關鍵所在。

南宋書坊商人迎合消費群以推廣書籍販售的例子還不止於此。小巧易攜的巾箱本又是另一種的行銷手法。巾箱本最早出現於南朝，但當時只是貴族、文人間的閒逸雅趣，做為案頭閱讀或收藏之用。然而，南宋時代的書坊商人卻從這種袖珍小字本的裝幀形式發現商機。巾箱本小巧輕便，正符合學子赴考不便攜帶過重書籍的最